

解放军入北平·北京与女学生的抉择

滨田麻矢

摘要：我们讲述当代中国时，1949年与1989年无疑是两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年份。本文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梳理人们是如何记忆，并回顾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在长达70余年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的记录仅有这两次。而这两次入京，却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前者作为辉煌的“解放”进程而被反复传颂，后者则成了不可触碰的伤口，只能在私下里、在国外讲述。两次事件都迫使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本文聚焦于解放军进城时，女学生在国事（共产党的统治）和私事（恋爱与结婚）间面临的个人抉择的小说。主要讨论对象是描写1948年北平的小说《红豆》与回顾1989年北京的小说《市场之爱》。《红豆》的作者宗璞（1928-）是忠实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红豆》讲述的是一个女大学生在跟随资产阶级恋人飞往美国还是留在北京参加新中国建设之间痛苦抉择的故事。后来宗璞却因为这篇小说被打成右派，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进行创作活动。《市场之爱》的女主角在1989年时还是北京某名校的一名学生，准备毕业后跟恋人一起赴美，而六四事件的发生间接地改变了她的命运。在经历了恋人与友人的背叛之后，她只能在故乡的小镇当一个孤独的英语教师。作品向我们展现了天安门事件是如何改变了这个对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女人的一生的。

作者李翊云（1972-）在大学毕业后赴美定居，一直都用英语创作。她对国家危机的态度自然跟宗璞迥然不同。两部作品都描写了解放军入京前后“不去/无法去”美国的女主人公对当年的回顾。

本文从这一共同点出发,探讨在爱情问题上的自我抉择与政治觉悟之间的关系。

序 言——解放军的两次进京

抗战时期,中国被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势力划分为三个区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又被国共内战分割成两半,知识分子不得不作出追随哪一方的决定。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直门和平进入北平城。同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未曾参与抗日、救国、革命等国家性“大事件”的作家们,也无一例外地迎来了祖国建设的时代。他们被要求表明自己的爱国情怀,被叩问去留,若选择留下,则要对党百分之百地忠诚。

40年后,1989年5月19日,不满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化。针对这些学生,时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发布了戒严令。6月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再一次从西直门走上了北京的繁华街道,次日清晨用坦克对全市进行了镇压。

1949年与1989年,人民解放军两次进城,却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前者作为辉煌的“解放”进程而被反复传颂,后者则成了不可触碰的伤口,只能在私下里、在国外讲述。两次事件都迫使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本文聚焦于解放军进城时,女学生在国事(共产党的统治)和私事(恋爱与结婚)间面临的个人抉择的小说。以宗璞(1928-)的〈红豆〉¹与李翊云的〈市场之爱(Love in the Marketplace)〉两篇作品²为中心,探讨在解放军进京这一历史事件下,

1 原载参照注33。本文引用的文本出自宗璞《宗璞全集》全4卷,北京:华云出版社,1996年。1卷共350页,2卷共449页,3卷共278页,4卷共507页。以下略称为《文集》。〈红豆〉为第2卷第1-30页。以下〈红豆〉的引用中,引文后出现的()指涉页码。

女主人公如何抉择自己的生存之路,以及多年后又是如何回顾当年这一决定的。

一,〈红豆〉——建国前夜的北平

首先整理一下〈红豆〉的故事梗概。

1956年,女主人公江玫作为共产党干部,回到阔别8年的母校(原型为清华大学)。旧相识的工友带她去看宿舍,正好与她上学时住过的宿舍是同一栋楼、同个房间。看着一切如旧的房间,她的目光停在一个镶嵌在墙壁上的十字架上。8年前,江玫把恋人送她的礼物藏在了这个十字架后面。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取出了那枚镶着红豆(相思豆)的戒指,戒指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鲜亮光泽。这枚戒指唤醒了8年前的鲜活回忆。

那时的江玫,正如她的绰号“小鸟儿”一般天真无邪。在一个雪天,她在学校练琴房里邂逅了物理系的青年齐虹。在文学和艺术上志趣相投的二人迅速相恋了,但江玫一直很在意齐虹倨傲的态度。江玫的室友萧素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向江玫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并不掩饰对齐虹贵族式独善其身的的不满。江玫的学生生活被齐虹的爱情和与萧素的友情撕裂着。齐虹无法接受江玫渐渐接近共产主义的现实,他有时嘲笑她,有时恫吓她,又有时流泪恳求她回到他的身旁。在一次吵架中,齐虹踩碎了江玫的红豆发夹。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爱情的破灭。但齐虹捡了那红豆,订制了一枚镶嵌着红豆的戒指,把它作为爱情不灭的象征送给了她。

彼时时局瞬息万变,在二人邂逅一年后的1948年冬天,北平易帜前夜,齐虹拿出赴美机票,让江玫与自己一同赴美。憔悴至极的齐虹苦苦

2 同注34。参照筱森ゆりこ译《市场の约束》《千年の祈り》东京:新潮社,第109-131页,本论文中的引用均为滨田所译。

哀求,江玫内心动摇,最终还是抛下一句“我不后悔”,选择留在共产中国。

江玫的回忆到此为止。实际上,此后的8年间,江玫逐渐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因回忆齐虹而流下的泪水很快风干了,她为迎接老友而微笑着站起身来。

在《红豆》中,江玫的大学生活被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与齐虹恋爱的艺术空间,一是与萧素学习共产主义的政治空间。这两个空间因引用文本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装点江玫与齐虹的公共空间的文本涉及贝多芬、肖邦、苏东坡、李商隐、济慈、勃朗宁、莎士比亚、《彼得·潘》、《呼啸山庄》等。通过这些引用或许可以看到作者自身对于文学与艺术的兴趣。宗璞大学时,教授英国文学的英国老师询问她喜欢哪位诗人,她毫不犹豫说是济慈。“感觉变得麻木的时候,济慈的诗句有时会蓦地跳出,直愣愣地望着我”³。对于当时二十来岁的作者来讲,济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另外,宗璞还写过关于勃朗特姐妹⁴和肖邦⁵的散文,并提及看《彼得·潘》的音乐剧是自己多年的夙愿⁶。宗璞受父亲冯友兰的熏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积淀。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搁笔时,她一直在为写苏轼传收集资料,虽然最后没能完成⁷,小说《红豆》以象征二人爱情的“红豆”为题,很难不令人想到王维《相思》中赞美的朴素爱情⁸。

另一方面,室友萧素给江玫推荐的书全是反映时代正义的著作。与齐虹邂逅的夜晚,萧素给了失眠的江玫一本《方生未死之间》。这是此后

3 〈没有名字的墓碑——关于济慈〉,《北京文学》1984年6月号,《文集》1,第242-245页。

4 〈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姊妹故居〉,《文汇月刊》1984年7月号,《文集》1,第246-250页。

5 〈钢琴诗人——肖邦〉,《文汇增刊》1980年7期,《文集》4,第222-228页。

6 〈潘彼得启示〉,《天津文学》1983年10月号,《文集》1,第232-236页。

7 〈自传〉,《红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文集》4,第334-337页。

8 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成为了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1913-1983)以笔名“于潮”发表⁹的作品。江玫在萧素的影响下加入合唱社和诗朗诵社团¹⁰,《黄河大合唱》令她心潮澎湃,她开始模仿艾青、田间的革命抒情诗进行诗歌创作。

在这些“政治正确的文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诗朗诵社团里,江玫朗诵艾青《火把》¹¹中女主角唐尼的部分。

她听到自己清越的声音飘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又落在他们心里。她觉得自己就是举着火把游行的唐尼,感觉到了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陌生的东西。而萧素正像是指导着唐尼的李茵。她愈念愈激动,脸上泛着红晕。(11)

长篇叙事诗《火把》描写女主角唐尼受到好友李茵的革命志向感染,坚定了自己意志的一夜。起初,唐尼执着于一个叫克明的青年。唐尼本就十分懊恼克明对自己不加理睬的态度,此时她又看见他与其他女性同路。然而当她悄悄听到克明对那位女性说“在国家大事面前,恋爱不过是妨碍”时,她对自己被个人的恋爱情感左右,偏离了革命这个伟大的目标而感到羞愧,并决心向他们学习,努力将“妨碍工作的恋爱”从心中抹去。李茵在赞赏克明觉悟的同时,告诫唐尼现在不能让恋爱妨碍克明的成长。诗篇以唐尼对好友李茵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结束。“李茵 / 你是我的火把 / 我的光明 /——这阴暗的角落 / 除了你 / 从没有人来照射 /

9 夏成绮《胡风与舒芜 中共五〇年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第43页。

10 梅家玲分析指出,抗日战争以后诗朗诵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目的,具有表演性的要素。梅家玲著,滨田麻矢译「战う文艺と声の政治——大分裂時代の「誦朗誦」と「朗誦詩」」,滨田等编《漂泊の叙事 一九四〇年代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分裂と接触》,东京:勉诚出版,2015年,第137-156页。

11 《中苏文化》第6卷第5期,1940年6月。参考《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第14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74-214页。

李茵 / 我发誓 / 经了这一夜 / 我会坚强起来的”¹²。

在将《火把》作为经典诵读文本的年代,读者应该很容易联想到“李茵”=“萧素”、“唐尼”=“江玫”的对应关系。然而和《火把》中“觉醒的男性与未觉醒的女性”这种简单结构相比,《红豆》描写了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

《火把》中,克明早已决定抛弃爱情加入革命队伍,面对纠缠他索要回信的唐尼,克明试图让她明白民族大事优先于个人爱情。这首长篇诗开篇即描写了唐尼把梳子夹在《静静的顿河》里,把粉盒压在《大众哲学》上,让口红躺在《新阶段论》上,以简单明了的画面表达了她有多么的“未觉醒”¹³。此外,在第7节也可以看到“那脸上涂了白粉 / 眉眼下垂 / 弯着红嘴的 / 是汪精卫 / 那女人似的笑着的 / 是汪精卫(略)那个汪精卫 / 花旦似的 / 向那日本军官哭泣 / 那日本军官 / 拍拍他的头又摸摸他的脸 / 那个汪精卫 / 女人似的笑了”¹⁴的描写,以“女人似的”一词来谴责“民族的敌人”汪精卫。也就是说在《火把》中,“恋爱”、“伪装”、“谄媚”这些均与“女人似的”一词相关,是为人所不齿的。女为悦己者容,是会沉迷恋爱的。在这种厌女症观念下,教导少女的方式也很简单:让她早点摆脱各种各样“女人似的”行动,学习“男人似的”政治正确的概念即可。

然而在《红豆》中,沉迷恋爱的并非女主人公江玫,而是她的恋人齐虹。面对政治觉悟逐渐觉醒的江玫,齐虹试图将她困在自己所在的文学与音乐世界里,并咒骂自己与江玫之外的所有人。此外,“未觉醒的男性”齐虹的缺陷,也并不像《火把》前半部分中唐尼那样显而易见。宗璞赋予了女主人公江玫鲜活的魅力,为了吸引这样的江玫,齐虹也需要强烈的个性。齐虹是一个专修物理(江玫认为物理是聪明人的学问),通读古今中西文学,能熟练演奏肖邦与贝多芬作品的才子。他与江玫共同爱

12 同注 11,第 209 页。

13 同注 11,第 176 页。

14 同注 11,第 190 页。

好的文学与音乐,同样也是作者自己酷爱的。两个深爱着文学与音乐的人之间的恋爱,绝非《火把》中所鄙夷的浅薄之物。然而,江玫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无论如何都需要与齐虹分手。因此,为了消解齐虹高尚趣味的价值,就需要给他配置一个有缺陷的品格——狭隘的占有欲。

二,引导少女的力量

试着剥掉故事中“革命”的外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构:女主人公渴望参与到社会事业中,而她的恋人却认为只要自己在她的身边,她就不需要有这样想法,另一方面对认识到男友缺点却无法决心分手的女主人公,她的女性朋友又怒其不争。《红豆》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引导并促成江玫与齐虹分手的是女性朋友萧素而非其他男性。最近的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基于革命观点,人们不再讴歌传统“母爱”,取而代之的是不少女主人公将引导自己的“大姐”视为一种模拟母亲¹⁵。而在《红豆》中,可以说通过将萧素与衰弱的江玫母亲一体化(以萧素卖血救助重度贫血的江母为象征),使其发挥模拟母亲的作用。

在《红豆》发表后次年,杨沫(1914-1995)出版了畅销书《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也讲述了一个“女知识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¹⁶,因被改编成电影而家喻户晓。女主角林道静在企图投海自尽时,被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永泽救起。永泽用海涅的甜美诗句向道静表达爱意后,二人结婚了。对于道静来讲,永泽是“诗人兼骑士”,而对于永泽来讲,道静则是“含羞草一样美妙的少女”。此后,道静遇见了革命青年卢嘉川,并逐渐被嘉川对政治抱有坚定觉悟和决心的态度所吸引。同时,

15 谢纳(“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5-39页。

16 杨沫《青春之歌》初版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参考文本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共631页。

她开始对永泽的世故圆滑、追随胡适、不关心现实社会、懦弱颓废的性格感到不满。终于,当嘉川因永泽被捕后,道静决意离开永泽。

“觉醒的女性决意离开未觉醒的男性”的情节,以及“虽精通文学却无政治觉悟的大学生”的恋人设定,几乎都与《红豆》相同。然而《青春之歌》中,女主角奉献了无限的信赖与爱的对象(即共产党)被具象化为一个“正确的”男性恋人(卢嘉川,卢在狱中死去后为江华)。特别是当江华说出“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吗?”这样的爱的告白时,道静的回答令人深思。

道静对因前夫背叛而死的卢嘉川难以忘怀,她想“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然而,稍微犹豫后她就得到了答案。“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¹⁷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被广泛宣扬的浪漫爱情不复存在,男女关系变成了能更好地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功利性关系。

故事结尾处她向江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只要我们的事业有开展,只要对党有好处,咱们个人的一切又算什么呢?”¹⁸。正如《青春之歌》“是非常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正是以通俗的描写来展开爱情剧才获得了大量读者”¹⁹。让道静与卢嘉川、江华这样的英雄式恋人在一起,使习惯了通俗情感剧的读者得以安心,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但不能忽视的是,女主人公最终得到的爱情,在“事业”和“党”面前其实被认为是“微不

17 杨沫《青春之歌》第 568-569 页。

18 杨沫《青春之歌》第 594 页。

19 胡军《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从《青春之歌》看“革命文学”叙事的重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30-33 页。

足道的事”。这样一来，“你”与“党”，恋人与组织已经可以划上等号，浪漫爱情已经被置于革命之下了。

与《青春之歌》相比，《红豆》中的江玫并非受到其他男性的启发，而是在同性朋友的引导下与恋爱诀别，并赢得了自己的主体性。这部作品在建国热情尚未褪去的1957年诞生，女主人公似乎必然要选择诀别前往美国的恋人，并献身祖国。然而在江玫的回想中，并没有过多言及她是如何成为“好的党的工作者”的过程。作为故事背景的50年代的部分仅占小说整体的十分之一，可以说仅仅是一个缝在故事上的镶饰。小说的核心部分无非就是1947年冬天开始的动荡时期。换句话说，也是作者在重述江玫在建国前夜如何被迫做出重大抉择的部分。此时此刻，应成长为革命家的江玫也许会因痴迷恋爱而行差踏错。摇摆不定的江玫所面临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危机就是齐虹恳求她一起赴美的场面。

“明天一早的飞机，今晚就要去机场。”齐虹焦躁地说：

“一切都已经定了，怎么样？咱们就得分别么？”

“分别？——永远不能再见你——”江玫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粒红豆。

“完全可以不分别，永不分别！玫！只要你说一声同我一道走，我的小姑娘。”

“不行。”

“不行！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点！你说过只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自己呢？”江玫的目光这样说。

“我么！我走的路是对的。我绝不能忍受看见我爱的人去过那种什么‘人民’的生活！你该跟着我！你知道么！我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玫！你听我说！”

“不行。”

“真的不行么？你就像看见一个临死的人而不肯去救他一样，

可他一死去就再也不会活过来了。再也不会活了！走开的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你会后悔的，玫！我的玫！”他摇着江玫的肩，摇得她骨头直响。

“我不后悔。”(略)

江玫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她觉得齐虹冰凉的嘴唇落在她的额上，然后汽车响了起来。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

她最后对齐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后悔”。(29)

《红豆》的故事舞台是作者的母校清华大学，宗璞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之一。冯友兰在宗璞出生之前的1920年代，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并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因国共内战激化，中美可能断交而于1947年回国。宗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战后从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庚子赔款创建的游美学务处，与美国交流频繁，即使在西南联大时代(1938-1945)，教授们也喜欢尽量用英美教科书。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共计179名正副教授中的156人有留学经历，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取得学位。他们的课堂大量使用英语，学生必须学会用两国语言记笔记²⁰。《红豆》所描写的是1948年的北京，仅仅是联大解散、各自返回本校的第三年。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有着丰富的美国背景，而宗璞自身也如上所述，钟爱济慈、勃朗特

20 Israel, John,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5.

等英美作家。可以想见,她对英语世界一定是感到非常亲近的。

1948年12月13日,大概在齐虹与江玫于雪中告别后不久,人民解放军来到清华大学校门前,准备进军北京城。在此前一天,做了清华大学17年校长的梅贻琦离开大学进入北京城内,12月21日乘坐国民党专机前往美国,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²¹。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先例,才会有齐虹恳求时所说的“走开的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你会后悔的!”《红豆》创作于反右派斗争前夕的1956年,在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需要一个具有革命意味的收场。然而最让读者回味不已的,或许不是江玫如何成长为“好的党的工作者”,而是国家兴亡之际,在纷飞的雪花中一对恋人永别的身姿。因为回忆的视线集中在“爱情”与“革命”的抉择上,对于与恋人分手后的江玫则仅用寥寥数行就草草交代了。

或许正因如此,该小说在发表之后立刻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批为“毒草”,1963年底至1978年间,宗璞不可以继续创作²²。如果江玫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见证了89年的民主化运动,她又会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选择呢?

《红豆》中,有一段关于游行的描写。国共内战时期女主人公们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试图拥护美国,冒着生命危险从西直门游行至天安门。

游行开始了,大家一步步的走着,一声声的喊着。“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要自由!”“要独立!”的口号像炸弹一样在空中炸了开来,路旁有些军警的脸上带了惊慌的神色。江玫几乎来不及去想喊了些什么,只觉得每一步路每一声喊都使大家更接近光明。(18)

在这场游行结束近40年之后的1989年,北京的学生们再次从西直

21 Bieler, Stacey,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New York City, N.Y: M. E. Sharpe, 2004, pp. 287–295.

22 同注7,〈自传〉,第336页。

门奔赴天安门，呐喊着自由与独立，占据了天安门广场。然而此刻“脸上带了惊慌的神色”的军队和警察不再属于国民党政府，而是江孜们期盼的解放军的部队。对于那时的大学生们来讲，赴美又意味着一种怎样的选择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旅美华人作家李翊云的英文短篇小说来探讨这个问题。

三、〈市场之爱〉——“六四”之后的美国梦

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作家李翊云还没有引起充分地关注。李翊云于1972年出生于北京²³，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教师。1989年6月4日，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她被父母反锁在家中。1991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开始学习细胞生物学。当时北大新生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而在接受军训。1996年大学毕业后，她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在学习免疫学的同时，也开始参加文学创作的讲座课程，并以英语作家 Yiyun Li 的身份出道。本文讨论的小说《市场之爱》，收录在她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千年敬祈》²⁴中。这本小说集荣获了包括第一届弗兰克·奥科纳国际短篇奖在内的五个奖项。截至2020年，她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两本，长篇小说三部，以及散文集两本，是当前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华人作家之一。

首先对《市场之爱》的梗概做一个介绍。

32岁的三三²⁵在中国的乡下小镇做英语教师，她没有丈夫、恋人，也没有亲近的朋友。由于她一直给学生看电影《卡萨布兰卡》，因此被称为“卡萨布兰卡小姐”。小镇上考入北京名校的只有三三以及和她青

23 本文中关于李翊云传记的事项均参考于筱森ゆりこ所写的《译者后记》中，收入前注所载《千年敬祈》第246-253页。

24 同注2。本文中引文后出现的()指涉页码。

25 关于固有名词的汉字表示，采用的根据小说的日语译者筱森ゆりこ向作者李翊云确认后的标记法。但是，包括题目在内的，小说引文的日语翻译均由滨田翻译。

梅竹马的土两个人,而之后只有三三回到了故乡。

十年前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的时候,三三和土并没有参与到运动热潮中。俩人在空空荡荡的校园中定下了婚约,这也是远在故乡的双方父母所希望的。不久之后,民主化运动受挫,不少大学生都失望而落魄地回到校园,这其中就包括“三三所见过的最美的女子”旻。她时髦大方、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广场上也被学生们视为女神,面对媒体落落大方。然而也因此与当局结仇而受到监视,陷入令人绝望的境地。三三在此时与落魄的旻成为朋友,她想方设法地要把她从绝境中拯救出来。当三三听说在美国有亲戚的人可以得到美国签证时,便制定了让有大叔父在台湾的土和旻假结婚的计划。打算等过几年旻能够在美国独立生活的时候,二人再离婚,然后土也能按照约定与三三结婚。但这个约定不久被打破了。三三从土那里收到“我与旻真的结婚了”的简短信件,之后她总是中毒似的磕着瓜子(后来得知这个瓜子里加了麻药),想象着土和旻的性行为,有时还把旻的形象想象成自己来自慰。然而,三三母亲的一次来访使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母亲告诉三三,旻和土前往美国十年了,现在他们离婚了。母亲要求三三“马上和土结婚”,而三三却只说“我不需要那样的爱情”、“我不想要那样的婚姻”。在母亲卖茶叶蛋的市场上,三三与母亲谈起土的事情,这时她才得知母亲(包括这条街上所有的人)一直认为她在和土有过肉体关系后被抛弃了。并且,原以为是意外去世的父亲,其实却在生前痛心她的行为不端,最终以一种说是自杀也不为过的方式离世。三三得知真相后感到十分震惊。当母亲得知三三还是处女后,很高兴地说“那就太好了”。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男性突然出现了。他在市场上当众用刀割伤自己,并用流出的血写下“给我十元,我的身体任你切割,死而无怨”。路人们好奇地靠过来,都以为他“疯了”或这是“新的乞讨手段”。三三的母亲“施舍”了他十元钱,但这个男人却安静地拒绝了,说“你不割的话,我不能收这十元。”三三把十元钱交给这个男人,然后从他那里接过刀,检视着他的身体,兑现了这一好不容

易找到的“约定”，三三充满爱意地温柔地割开了这个男人的身体。

在英语世界的评论家们承认李翊云在对人生荒谬的处理方面有着罕见的才华，并认为《市场之爱》这部小说通过令人震惊的肉欲描写，剖开、呈现了人的自尊心是如何的不可思议²⁶。也有评论说，三三坚信自己是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恋人，她把她自己的一生赌在了这个信念上，对她来说，十年后的求婚不构成任何意义，当时的誓言使得最后的血腥场面变得更为令人不寒而栗²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约定”和小说最后喷洒而出的鲜血的确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

在市场上，当母亲委婉地(但很固执地)询问三三，她和土之间是否有过性关系时，三三才发现，原来母亲和镇上的人们以为她是“不会再在床单上留下处女痕迹”的可怜女人，所以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在故乡这个小镇居住的人们，都认为她已经不是处女了，所以没办法结婚，对被土抛弃的三三报以怜悯的同时还夹杂着蔑视。虽然直到得知土离婚的消息为止，三三都未曾发觉，但在与母亲的对话中，“自己的处女性”早就在自己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存在”了。

三三在此时，第一次明白了镇上的人对于自己宽容的理由。她是一个被恋人当食物咀嚼过就扔掉的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因在初夜的床上，无法在白色床单上留下处女印记而无法结婚的女人。

(107)

三三几乎每天都在幻想着土和旻的性行为，甚至有时沉浸在自慰中，但母亲认为，无论如何，女儿“是为了他而守着贞洁(下线部原文为斜

26 Faber, Michel, “Rotting fruits of revolution”, *The Guardian*, 07/Jan/2006.
<http://gu.com/p/xextp/sbl>

27 Welch, Rodney, “Cultural Revolu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27/Nov/200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1/23/AR2005112302098.html>

体标记)”。尽管三三试图证明“处女”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結果,并不是“为了土而守护的”,但这种解释在母亲这里却行不通。此时,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了。在市场中也只有她对“我的身体任你切割”的指示做出了反应。

她仔细盯着他露出的黝黑的皮肤和静静流淌着鲜血的伤口。她一边用手指慢慢地检视他的上臂,一边将手指滑向他的肩膀。她每次抚摸他的肉体时,男人的身体总会微微一颤。(略)

男人的肌肉随着她指尖的爱抚而放松下来。这么多年来,她终于遇见了一个知道什么是“约定”的人。(略)

三三对母亲露出了微笑,“妈妈,不用担心”。随后便把刀放在男人的肩膀上,缓慢地、充满爱意和温柔地割开了他的肉体。(110)

三三没有失去作为处女的证据,也没有流血。她默默地靠近市场上的男人,检视着他的肉体,“充满爱意地”“割开”。在小说中,结尾这段市场的描写都是用一般现在时完成的,这样处理不仅强调了鲜血淋漓的画面感,也让人感到这过于突如其来的结尾好像是描绘着梦中故事的剧本一样。

三三握着的刀成了男性性器官的代替物,遵守了约定,默默地割着颤抖的男人的肉体。于是,在此处迎来了故事的高潮,血流了出来,约定兑现了,“爱”被发现了。渴望被割开肉体的“男人”可以理解为是由三三被压抑的欲望所召唤出的形象。与这个不同于土而遵守“约定”的男人相遇,三三也终于可以不再是“不被人渴望过的处女”,而变成“有欲望的、割开肉体的主体”。

幻想未婚夫和友人的性爱场面的前半部分中,也有描写到三三的欲望。

旻如绢绸般的长发轻抚着如芹菜根茎般的土的身体,挑逗着他,诱惑着他。土把如菜花般大的头埋进旻那丰腴的胸部,像是饥肠辘辘的丑陋的猪仔一般寻找着乳房。任凭想象驰骋,去想象他们愚蠢的姿态。三三明白,那样戏剧化的形象对于土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旻的魅力却是如钻石般无法穿透的(impenetrable)。(100-101)

旻这种无法穿透的(impenetrable)美,似乎也暗示着土(正如名字般的土气)无法“在性意味上穿透/渗入”美丽的旻。旻是“三三在大学里见过的人里最美的,尽管经过了十年,但在她的印象中依然是最美的”,三三的心也被这种美所占据着。天安门事件之后,完全没有参加过运动的三三主动接近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媒体前的旻,当旻成为了自己的朋友时,三三在感到“高兴和感激得忘乎所以”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好像借着旻的不幸趁虚而入,有少许的愧疚”。而关于三三和土的爱情,从1989年的罢工开始的恋情,却以“他们开始变得亲密,像包括父母在内的乡亲们所希望的那样,坠入了爱河”这样一行文字简短总结。

重新回到故事时间轴上梳理一下。土和三三没有参与到震动全国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中,而是“按照乡亲们期待的那样”坠入爱河。但是,当这一运动遭受挫折的时候,三三“意想不到”地与美丽的旻发展出了友情。三三非常想把旻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还让她与自己的恋人假结婚。被两人背叛的三三想象着他们的性行为,想象中的旻愈发被美化,而土的形象则被丑化、变得更加具有讽刺的意味。

若将三三的这种心理结合结局中“被割开的肉”来思考的话,可以看出,三三拒绝与离婚后的土结婚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初的约定被打破了。夺走她的心并不是土,倒不如说是旻。或许也可以说,三三对于旻的欲望,被手持着刀的“男人”召唤出来,并最终转化为“割开他的肉”这一“爱的行为”²⁸。

四,从当事者到旁观者

再回到对美印象的问题上。教育史研究表明,80年代以后,中国的留美热潮高涨。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风靡一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话题,同年周励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²⁹。

在天安门事件之前,80年代的中国就反复上演了多次政治宣传运动(如1981年对白桦的《苦恋》的批判、1983年对“精神污染”的批判、1986年对方励之的批判等),这些运动让留美中国学生感到了不安,他们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卷土重来”。在天安门事件后,1990年乔治·布什面向留学生颁布了一条法令,其内容是“1990年4月10日之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其是否拥有资格,都承认其可居住至1994年1月1日”的。这条法令影响深远。1993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宣布“中国留学生回到祖国也是安全的”,而在此后的一周里,有22000名中国留学生开始申请绿卡或市民权³⁰。一直以来,归国留学生无法从事高尖端职业的情况时有发生,赴美中国留学生不回国而选择移民的情况也无法得到遏止。李翊云自己也可以说是其中一员。虽然她从10岁起便想要出国,但她拼命地向父母隐瞒了这一想法,决定首先在化学专业上积累经验。对她来说,英语和英语文学是她走出家/国的必要途径³¹。如此看来,在经历过天安门事件、军训后,进入北京大学时的她可以说已经一只脚踏出了国门。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市场之爱》中大学毕业后的三三微

28 李翊云对于同行羁绊的描写的作品并不在少数。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中收录的短篇中便以“The Princess of Nebraska”和“Son”之间的同行爱情为主题。

29 Bieler, op.cit., pp. 350-352 による。

30 同注 21, p. 355

31 Rustin, Susanna, “Yiyun Li: a life in writing”, *The Guardian*, 13/Apr/2012.
<http://gu.com/p/36nky/sbl>

笑地哼唱着英文歌,想着“如果能去美国的话,我随时都会抛下学生”的描写。而这正是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投向当事者的从容微笑。然而三三不久就被恋人背叛,课堂上不再放映她曾经喜欢的《音乐之声》——一家人平安从纳粹手中逃脱的故事,而开始给学生看《卡萨布兰卡》——一个男人为了将心爱的女人送去新天地美国,而选择牺牲自己的故事。三三试图通过《卡萨布兰卡》的反复放映,将被抛弃在中国的自己置换成这个美好的自我牺牲故事中的主人公。

事实上,虽然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改变了三三的命运,但她原本却是“少数没有去广场的学生”中的一个。在祖国民主化的大潮中,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当事者的意愿。《红豆》中的江玫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从文学和艺术走向了革命和爱国,但三三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民主化运动带来的启蒙。《红豆》创作于建国热情还未消退时期的中国,而当民主化运动遭受挫折并在中国国内被淡忘的时候,作者则在遥远的美国写下了《市场之爱》。可以说,两位女主人公分别反映了两位创作者所处的时空背景。

结 语——超越浪漫爱情

本文选取的两篇文本,在时代背景、故事和书写语言上各不相同,但其共通点是都以解放军进城这一“事件”前后的北京校园作为故事舞台,讲述了未能前往美国的主人公的回忆。本文也试图从这一共通点出发进行解读。最后让我们回到女学生在面对恋爱问题时的个人抉择主题上,以中国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丁玲为参照系进行讨论。

在浪漫爱情的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以来,民国时期的社会渐渐形成了“女性是一个更为重视爱情的性别”的认识。宗璞的叔母、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写的《旅行》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³²。新文学一直强烈主张以

32 《创造周报》45号,1924年3月,笔名淦女士。

自己的意志而非家长命令决定恋爱对象,这是一种十分崇高的行为。直到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文学明确地揭示,这世上存在比“爱”更为重要的价值观,这种范式才开始有所动摇。以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³³为例,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在抗战时期陕西农村的故事。被日军绑架成为慰安妇的主人公贞贞因患上性病,在回到故乡后遭受村里人的白眼。在日军到来之前便与她相爱的夏大宝,不顾村里人的轻蔑,想拯救她并向她求婚。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我”(以丁玲自身为原型设定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希望“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但原本爱着大宝的贞贞,却拒绝了这个难得的婚约,“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一样狂暴,最后选择前往革命根据地延安,在那里治病、学习。当贞贞最终拒绝她曾爱过的男性的求婚时,只有和贞贞一样被同村人视作异端的“我”才能理解她的这个决定。

对于没有选择爱情的贞贞,“我”虽然起初“觉得非常惊诧”,但是后来“觉得她的确值得我研究”,并相信在革命圣地延安“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了”。

《我在霞村的时候》也与本文探讨的两篇小说一样,是“女主人公没有选择与喜欢的男性结婚”的故事。故事中的村里人“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他们轻蔑被日军蹂躏的贞贞时的视线,让人联想到《市场之爱》里小镇上的人们投向三三的轻蔑和怜悯的目光。家人们一心想着只要男女双方能够破镜重圆就能万事大吉,因而不断催促女主人公与夏大宝/土结婚。他们企图将女主人公强行套入人们所熟知的稳妥的女性形象中去,给女主人公带来的这种压力也是相同的。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使得贞贞成长的已经不是“引导启蒙的男性”和“向他学习的女性”这种熟悉的关系,而是成为“彼此不可或缺”,可以

33 《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

坦诚相待、相互鼓励的女女纽带。女主人公拒绝曾相知相爱的男性的求婚,而选择与女性朋友共同迈进新世界的这一结构,则与《红豆》是相通的。

在鲁迅唯一一部描写恋爱的小说《伤逝》中,子君除了恋人涓生以外,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渠道,因此当她被涓生抛弃后,只能回到故乡迎接死亡。此外,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薇龙,她一方面知道乔治完全不爱自己,一方面却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他,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相反,不论贞贞还是江玫,都没有选择与自己喜欢的男性结婚,而是与志同道合的女性一起相互支撑,找到了“比爱更强烈的信念”。自庐隐的《海滨故人》以来,女性友人之间的美丽而脆弱的友情,开始成为支撑女主人公的坚韧纽带。但这些女性友人之间的纽带必须建立在“党”这一绝对存在的基础之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浪漫爱情意识形态就长期影响着少女们的自我抉择,为了摆脱这种观念,人们需要共产主义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为了展现共产主义这一万能处方的伟大,就必须讲述少女们甚至连爱情都愿意放弃的故事。

但是,在 21 世纪用英文创作的《市场之爱》中,就看不到对“党”的忠诚了。三三不仅不相信党,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们拥护民主化的热情也没有什么兴趣。她不选择与曾爱过的土结婚,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女同伴的协助与支持,而是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了。三三不再相信过去与土之间曾有过爱情,鼓动她的是手中作为性器官替代品的刀,是颤抖地等待着被割开的男性的肉体。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爱情,对于三三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在中国本土无法书写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作家都离开了中国。1952 年,32 岁的张爱玲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曾风靡一时的城市上海。到达美国后的张爱玲虽然用英语写了很多作品,但她的心态始终没有进入英语世界,无论是人物、时代还是主题,她留给后世的作品都停留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尽管张爱玲前往了美国,但她或许始终是一个“没有完成越境的作家”。

这或许也与她的英文小说并没能如自己所期待地那样被英语世界所接受有关。

李翊云或许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成越境”的作家。她的长篇小说《比孤独更温柔》³⁴，以天安门事件后在北京发生的毒杀未遂事件为主题，分别通过事件后前往美国和留在北京的相关人员的不同视角，回顾“六四”后沉沦的北京³⁵。无论是前往美国还是留在北京的出场人物，他们都与《市场之爱》中的三三一样，与现在的中国保持了“非当事者”的距离。这一“距离”很有可能与作者只选择英语为创作语言有关，但她所描绘的中国能在美国收获大批读者，大概不能说与她“完成越境”的心态也毫无关系。然而，这究竟是为了“迎合英语圈”，还是一种“世界文学的态度”呢？有关这一问题，似乎需要追根溯源地去探讨何为“中国文学”，何为“世界文学”，以及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应当存在不同，而这也是一个必须不断追问下去的问题。

解放军の北平入城——北京と女子学生の選択

要旨：本論は、同時代中国の大きな節目となった1949年と1989年、つまり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成立した年と、建国後最大の民主運動が挫折した年を、文学作品がどのように回顧しているかに着目し論じたものである。70年余にわたる共和国の歴史の中で、人民解放軍が北京市街に入城したのはこの二度だけだ。そしてこの二度の解放軍北京入城は、全く種類の異なる記憶となった。前者は共産党による北京市民の「解放」と

34 *Kinder than Solitude*, New York City, N.Y.: Random House, 2014, 312pp.

35 Li, Yiyun, “This is my generation. It’s what we experienced”, *The Guardian*, 30/Mar/2014.

して繰り返し語られる輝かしい物語となり、後者は触れてはいけない傷として、主に国外で語られる秘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の二つの事件は、どちらも中国の若い知識人たちに、自分が国家とどのように向き合うのかを否応なく考え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た。本論は、この解放軍入城に際して、女学生が国事（共産党の統治）と私事（恋愛と結婚）について自己決定を迫られた小説をとりあげる。中心になるのは一九四九年の北平を描いた宗璞（一九二八～）「紅豆」と、一九八九年の天安門事件を遠景としたイーユン・リー（一九七二～）の「市場の愛（Love in the Marketplace）」の二篇である。「紅豆」は新中国建設に献身を誓った作家による短篇で、1948年、人民共和国内閣前夜の大学を舞台とし、ブルジョワの恋人と米国に亡命するのか、北京にとどまって祖国建設に献身するのか苦悩する女子大生の葛藤を描いたものだ。しかし宗璞はまさにこの作品によって右派とされ、文革期も長く執筆停止を強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市場の愛」のヒロインは1989年の六四天安門事件当時、北京の大学生だった。卒業後ともに渡米するはずだった恋人に裏切られ、田舎町で孤独な英語教師を務めている。政治に無関心だったはずの彼女の一生を、天安門事件はどう変えたのか。作者イーユン・リーは大学卒業後に渡米し、創作は全て英語で行っている。人民解放軍の入城という「事件」前後に米国へ「行かなかった／行けなかった」ヒロインの回顧を描く、という共通点から、愛情における自己決定と政治の関係について考察した。

Beijing and the Choice by Female Students in Beijing: Liberation Army March into Beijing

Abstract: On January 31, 194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eacefully marched from Xizhimen into Beijing.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llectuals who had previously eschewed the national debate wer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either remaining in the country or leaving it behind. Then, on the night of June 3, 198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ce again entered the city from Xizhimen, this time to open fire on students who had occupied Tiananmen Square and silence their protest for democratization. These two marches into Beijing became memories of an absolutely contrasting nature. The first was continually retold as a defining mo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while the second became a national wound, not to be spoken of.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introduce novels in which female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national (political) and personal (romantic) dilemmas, chiefly Zong Pu's "Hongdou" and Yiyun Li's "Love in the Marketplace." The former, set in 1948, depicts the dilemma of a student fleeing to America with her bourgeois lover or remaining in Beijing to help rebuild the country. The latter, set against the 1989 incident, concerns the loneliness of a woman whose failed attempt to travel to America sees her employed as an English teacher in a rural town. How do these heroines negotiate their futures and later look back upon their decisions, in respect to such historical even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two novels, I will reflect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individual agency.